

公元九五六年印本陀羅尼經

Soren Edgren 作
高 禔 熹 譯

在湯瑪斯·卡特(Thomas Carter)原著「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古德瑞(C. C. Goodrich)教授修訂版(一九五五年,紐約出版)中,古德瑞氏曾提出兩種公元十世紀印刷的漢譯「陀羅尼經」(dhāraṇī-sūtra)(一種用以祈福避邪的符咒)。這兩種印本,係在浙江省杭州地區所發現。一九二五年卡特氏著作初版問世之際,尙不知有此印本。該兩種印本都是「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文」,是由印度高僧阿目佉跋折羅(Amoghavajra 七〇五——七七四年)所譯成的。阿目佉跋折羅大約於七二〇年(唐玄宗開元年間)東來中國,後來師事金剛智三藏(Vajrabodhi)學習佛法,法名「不空」。此兩種印本佛經分別刊行於九七五年和九五六年,在經文之前皆有一段題詞,而且都由錢淑(九二九——九八八)贊助而得以出版。錢淑乃五代時期吳越的第五位國君,從九四八年至九七八年統治吳越,掌握政權達三十年(吳越國相當於今日浙江全省、江蘇省一部分和福建省北部一帶)。九七五年的印本在世界各國公私立圖書館內尙有不少藏本,而九五六年印本,古德瑞氏在其書第六十九頁附有圖片,並稱係紐約的私人蒐藏。此件可能是海內外現今僅存的孤本,目前為瑞典皇家收藏。

印刷術,正如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樣,也是五代時期(公元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偉大的活動與發展項目之一。唐朝到五代時期殘留的印刷品,至今已極為罕見。它們對於吾人了解中國早期印刷的歷程極為重要(尤其那些載有確實日期者)。

敦煌地區所發現宋代以前之印刷品,以及許多中古時期之手抄本,由於該地空氣乾燥,故能保存至今迄未損壞。目前這些印刷品與手抄本,大部分都藏在倫敦和巴黎。在這些珍本之中最著名的要推倫敦大英博物院所藏公元八六八年刊印的金剛經。其他有年代可考的印刷品,包括在四川成都唐明古墓中發掘出的八世紀的符咒,九世紀的曆書,十世紀的單頁佛經,以及上述九五六年及九七五年兩種佛經。

與中國印刷有關的事項,吾人尙可從中國近隣

日本與韓國得到兩項早期的個別例證。世所共知的日本孝謙天皇(Shotoku)敕印佛經,是在公元七六四年至七七〇年間在日本印刷的。最近在韓國發現的、卷帙龐大的陀羅尼經,據稱係八世紀前半期所刊印。在這些留存至今的早期印刷品中,非常有趣的顯然多屬宗教性的符咒和贖罪符,這些可明確的指出印刷的起源是由於共同的信仰。

前述兩件十世紀的雕印本佛經,是分別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四年發現的,但直到一九二六年才有人撰文予以報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靠近西湖南岸,享有九百五十年歷史的雷峯塔忽然崩塌。該塔外部木造部分和外磚表面,很久以前即遭焚毀,後來又經過剝掠,剝餘的斷垣殘壁,無人過問達二、三百年之久。無疑地,任何人都沒料想到,在殘破的廢跡之中,還會藏有什麼寶藏;但這些殘破的磚孔之內,竟發現藏有小巧的印刷經卷。這些經卷上都記有中國干支紀年「乙亥」(公元九七五年)兩字,該年正係建塔年代。究竟發現了多少件經卷,其正確數字無人能詳,但其數量必然相當豐富則為無庸置疑的,不過其大部分可能因疏於保護而致腐朽或損壞。李書華氏引用胡適博士語云:「一九二四年,雷峯塔完全崩毀時,發現了許多這類的經卷,一元就可買得數卷,但後來則漲價到一百元才能買一卷。」

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已有這部佛經的精美複印本刊載在日本京都有鄰觀的收藏目錄中,但關於其出處則記述並不確實。這些經卷發現之後不久,大英博物院曾獲得一卷。一九二五年倫敦出版的「皇家亞洲學會會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並且刊載有數篇討論此件經卷,以及雷峯塔歷史的文章。除去倫敦有此經卷之外,據悉美國擁有四卷,日本也有四卷,中華民國台灣和大陸北平也至少各有一卷。這些經卷之中,有一半還完整的保存有介於經文和載有日期的題記之間的版刻扉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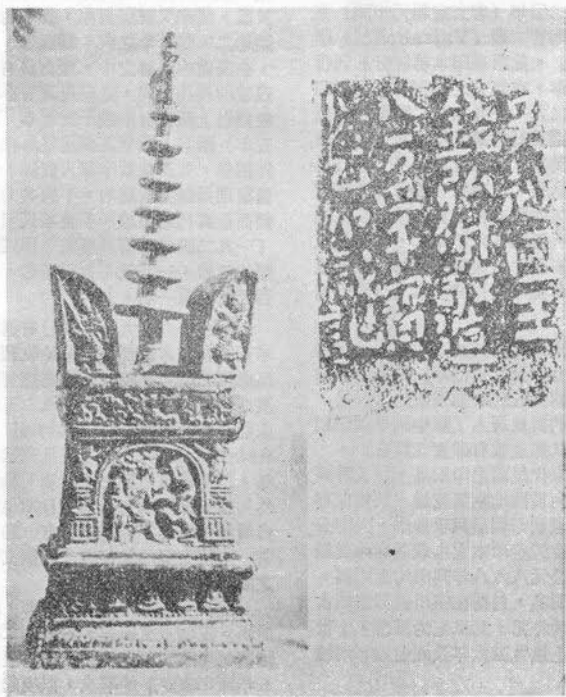
至於「九五六年印本佛經」的情況則並不如此清晰。正如上文所述,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的「圖書館學季刊」上,莊嚴氏曾發表一篇關於「九七五年版印經卷」的專文,以喚起世人對此方面的注意。很可能就是由於眾所週知及學者的關心,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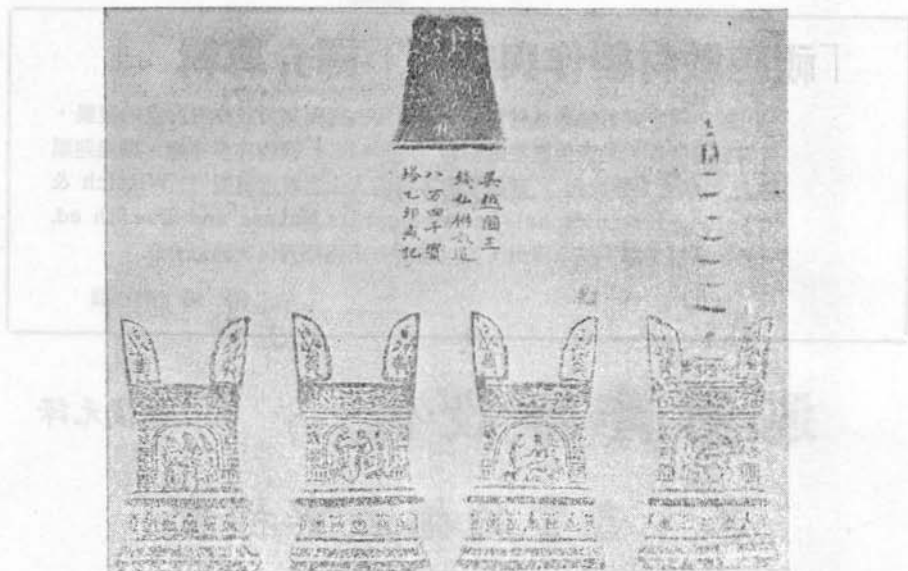
雷峯塔發現後，早期印本經卷的持有者注意其到存在，雖然尚不知其名為何物。一九二七年王國維氏「觀堂集林」修訂版中，載有他一篇關於九五六年印本佛經跋，題目為「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跋」。顯然王氏曾親眼見到該印本經卷，並且以此最古老的印刷物出於其故鄉浙江為榮。不過事實上，王氏與莊氏都把題詞中的顯德三年誤為二年，同時對下面的文字也有所誤解，不由得不使人認為他們的經卷首部分可能已有殘損，王氏並稱該經卷係為烏程張氏所有。王、莊二氏都拿它來與兩世紀以前日本所印並貯放在木製小塔中陀羅尼咒經卷相比較，以為其與錢奴在九五五年銅製金塗小塔有關聯。他們引用「大唐西域記」一書，說明把微小的手寫經文密藏在不到五、六寸高的塔內的習俗，在印度相當的流行。他們一致認為其經卷出自於湖州的天寧寺。然而王氏又說，他懷疑它可能就是在這所寺廟中的某一石製經幢中所發現的（如圖一）。所謂「經幢」即一種石柱，在其表面上刻有佛教的圖案或經文，其基部都和頂部都有如寶塔一樣的級層。

據湖州府志記載，該寺始建於公元五五九年，名曰龍興寺；七〇六年改名為孝義寺；到五代時期吳越國王錢鏐又將之命名為天寧寺。寺內的石製經

幢造於九世紀。據清代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考證，當初經幢凡有十四座，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文，但到康熙年間，就只剩下八幢。朱氏友人鄭元慶曾將全部經幢上的石刻經文墨拓下來，送請朱氏鑑賞，朱氏並撰一文跋其後。據最近浙江省的一項古代建造石碑調查報告稱，朱氏所述有日期可考的八座經幢，現尚存有七座。然其中有四座已經殘破，且已不能判斷其日期。圖一是浙江金華一寺廟內發現的一座經幢。其建造年代比湖州者要晚二百年，雖然它們並不完全相同，但其大小與形式則屬一致，能予人以同類物品的印象。

另外一個與此印本佛經有密切關係者為上述金塗塔，它們是錢奴敕令大量製造的（可能是仿照印度的偉大佛教維護者阿育王神話所造）。這些金塗塔高約二十公分，四周有浮彫圖案，描述阿育王的故事，圖二墨拓本可見其大概，內部有銘文，曰：「吳越國王錢奴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如圖二）。這一點很容易使人相信，這些小塔是預備用來貯放次年刊印的小經卷的。這些小塔係銅鑄鍍金，然而最近在前述金華的寺廟中也曾發現有鐵鑄的（時間為九六五年）。這寺廟也正是圖一所示十一世紀「經幢」的來源所在，錢奴所製八萬四千個金塗塔，在中國久已知名，而且被視為其熱烈





圖二

支持佛教的一項明證。在九五六年印本佛經發現前不久，馬伯樂氏(Henri Mespero)曾為這些金塗塔撰寫了一篇報告。

據九五五年鑄銅塔上的銘文，(以及在九五六年印本佛經上發現的文字)，吳越國第五位國王名叫錢弘俶。事實上，「弘俶」是他的原名，但由於歸順趙宋，而宋太祖的父親名「弘殷」，為避諱起見，遂改為錢俶。九六五年鑄金塗塔上的銘文只有「俶」字，九七五年印本上則為「錢俶」兩字。其經文中，尚可以窺見它避「殷」字，因為宋朝始祖名「玄朗」。

一九三六年，浙州的一份刊物——「文淵學報」，為了浙江的文獻展覽，特出版一期合刊本，其中有潘廉深氏所撰關於九五六年印本佛經的一篇引人注意的報導。此文可能是關於該印本唯一可靠的報告。潘文提到一九一二年天寧寺坍塌，隨後改建為浙江省立第三中學。潘氏就在此年受命為該校校長，發現到那八座不為人注意的經幢。在一九一七年夏季，似乎是在學校作工的工匠，在大廳前面所放置的兩個經幢附近工作時，無意中發現散出的一些經卷。數日之後，潘氏設法覓回此二卷(潘氏文意不甚清晰，不知是否僅此兩卷找回，但我希望如此)，並將其中之一贈送給于姓友人關的圖書館。十三年之後，潘氏在南京看到王國維氏於印本佛經的論文，就想弄清楚他以前贈給于氏的經卷究竟是否，以及如何會轉於烏程張氏所藏收，但未能如願

。在繼續敘述該印本經卷之後，他證實了王氏所說係發現於「經幢」中的推論，但他承認經卷究竟是何時裝入經幢的問題，仍不能解答。潘氏又稱：到他撰文時為止，在天寧寺外面只剩下兩座經幢，其餘的都已運到吳興縣立圖書館保存。他所持有的一份九五六年印本經卷，那時也典藏於該館。

一九三六年以後，無人知悉此兩卷印本佛經的確實情形，但從那時起，在日本也從未發現；中國政府當局也否認擁有其中任何一卷。將來有一天，在小鋼塔中創造了另外一卷，而為人所發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上述兩種印本的特點非常相似。除了都是同一經文外，在卷首載有日期的題詞中都承認由錢俶擔任印造八萬四千卷，繼之為長方形的木刻扉畫(見圖三)，描繪佛教信徒在祭壇和神座前膜拜。每一卷都由四張紙接續粘貼而成。九五六年印本全長二二二公分，每一張高度為七·一公分(印刷部分高四·八公分)；九七五年印本則全長約有二百公分，每張高度七·二公分(印刷部分高為五·八公分)。全部經文約計二千八百字。九五六年印本共有三四一行，每行八字(亦間有七字、九字、十字者)；九七五年印本則分為二七一行，每行十字(亦間有十一字或十二字者)。九五六年印本所用紙張為桑皮紙，紙面光滑，重量適中，近乎淺棕色。這部印本完整無缺，保存情形良好。

(下文轉第14頁)

否影響適用的設備，對環境污染的程度等。

(二)生產的要求：複製發行量的大小，捲片與片狀發行量的比例，複製數量的多寡以及發行的頻度，產品品質要求的程度等。

(三)現有的技術：如果複製作業已在進行，則如何獲得增添的設備及使用技術，對人員的訓練，縮影資料的儲存和管理。

— 四系統的需：縮影母片的來源以及其極性，需要複製片之極性，其主要用途是為閱讀或為放大複印，或為直接複製發行等。

(四)金錢的消費：金錢的消費乃是系統選擇的結果，例如機器設備，工具、訓練、材料等消費皆取決於所採用的系統型式。

金錢的消費雖然重要，但其他限制因素往往更應優先考慮，上面所舉的只是一些常見的因素，實際上應配合個別的情況加以選擇，使能適合使用者本身所需要的系統。

選擇了複製系統以後，必需再選擇可以達到最高複製效果的複製片型式。限制複製片品質最主要的因素在於母片的品質，優良的母片可以得到好效果的複製片。在選擇複製片型式時，必需注意母片影像的反差 (Contrast)，以決定採用高伽瑪值 (High Gamma Value) 或低伽瑪值的複製片。當母片的反差均一時，可採用高伽瑪值的複製片，而母片反差不均勻時，則應採用中度反差的複製片 (Medium Contrast film)。

粗淺的劃分，電腦輸出微片 (COM) 或以發行微片資料為專業的機構，或有高品質母片來源的機構，多可採用高反差的複製片，而一般文件之縮影片，或原稿為拍攝色彩及圖片，或母片之色調、厚薄、重量都不甚均一時，以採用中度反差複製片為宜。

參 考 資 料

1. Films (Original and Duplicating) by Glenhan C. Mezher The Journal of Micrographics Sept/Oct 1977
2. Azo Dyes; Encyclopedia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y Kirk-Othmer.
3. Micrographic Systems by Daniel M. Castigan.

(上文接第37頁)



圖 三

在五代時期，錢氏家族以熱心支持佛教而聞名，並曾興建多座寺廟和石碑。因而吳越獲有「佛國」之稱。錢俶雖然如此熱心，但吾人對其誓願刊印八萬四千卷這兩種的經卷，以及塑造同等數量銅質或鐵鑄塗金寶塔，不免懷疑其真實性。固然這兩種印本的發現僅各在一個地方，但這些經卷曾大量印行，廣散於吳越全國，應是合理可信的。此類寶塔和九五六年印本經卷間的關聯，大體上只是象徵性的，它們也許只用來保護相當小量的經卷，其餘的經卷則已分別散發了。同樣的，雷峯塔可能只收藏一小部分的經卷 (以紀念該塔之建造)，而其餘大

部分經卷則拿來供出售或贈送。而經卷在佛教信徒之間廣泛流傳，也可能是它消失的原因。

據現在常見的九七五年印本經卷同一部分的照片，顯示出是用四或五塊不同的木板雕刻的，(在未提出具體反證之前，我相信，這是當時的印刷方法) 以致各印本不能完全相同，它充分表明印刷數量的限度。當所有的照片影本能集中在一處，來比較現存於世的各種印本，也許能給予我們一個線索，找出它究竟印有多少卷，以及當時的印刷方法。這兩種印本在印刷的時間與地區方面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我們作更密切的研究和更深入的調查。